



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上海科改“25条”给科研人员送上收入分配机制“礼包”

一季度技术合同数量成交额显著增长

本报讯(记者 俞陶然)记者从上海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获悉,一季度,市属科研院所的技术合同数量和成交额显著增长。如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的技术合同有35项,同比增长106%;合同成交额208万元,同比增长288%。

分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4类,简称“四技”服务。其中,技术转让领域的科技人员奖励规定,写入了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国务院2016年16号文件指出:“对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开展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给予的奖励,可按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本规定执行。”

蒋书洪持后一种观点。他告诉记者,市农科院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奖励金发放受绩效工资总额控制。由于“三技”服务的收益不能分配给员工,一些科研人员从事技术服务与推广的积极性不太高。市农科院向相关部门反映了他们的意见,这个问题也关乎其他市属科研院所。

说,这条规定在送给科研人员“礼包”的同时,也通过“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把以前一些隐性的“三技”服务显性化,更有利于管理和服务。文件发布后,这条规定可谓立竿见影,有效拉动了本市科研单位的技术合同数量和成交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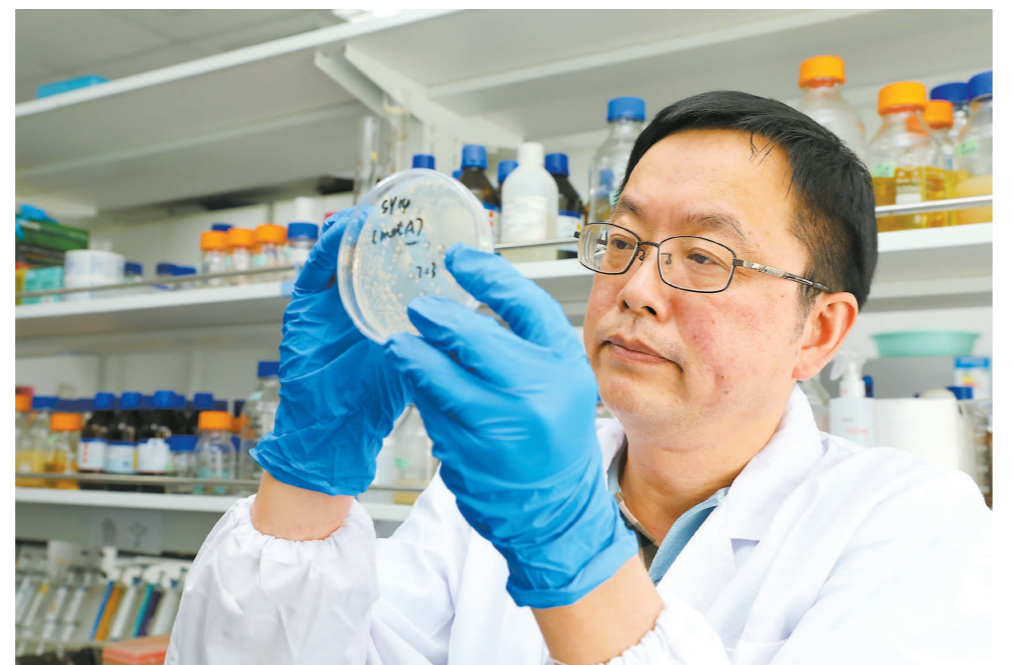
率团队国际上首次人工创建仅含单条染色体的酿酒酵母,覃重军获2018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要做就做“从0到1”的开创性工作



本报记者 黄海华

在覃重军异想天开地思索,能否把酿酒酵母的16条染色体人工减少到1条之前,全世界上万名科学家已发表了几十篇有关酿酒酵母的论文,这当中并没有他的一篇文章。然而,在被专业同行忽视的情况下,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创建了自然界并不存在的简化生命——仅含单条染色体的酿酒酵母。



覃重军在观察单染色体酵母的生长情况。 杨正行 摄

这并不是矫情,即使在1993年写给妻子方萍的第一封情书中,覃重军还在谈论着自己的科研理想——要在某一具体学科做出里程碑式的贡献。就在这一年,他确立了自己的五个梦想,要在重大基础研究、原创技术、产业化、解决人类疾病和新理论上有所突破。

在科恩门下学习时,覃重军从这位风趣的科学家那里得知,科研有多重境界:伟大、开创、前沿,或者混饭。他更加坚定决心,要像科恩一样做出生命科学史上能留名的开创性工作,更要像他的偶像巴斯德、爱因斯坦和达尔文一样做出划时代的工作,而不是“混饭吃”的职业工作。

“不知轻重”的疯狂举动成功了

“我刚回国时,想得更多的是产业化。”2001年7月,覃重军选择了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其在微生物产业化方面的特色,强烈地吸引了他。

全球市场,中国使用的多拉菌素均依赖进口,价格昂贵。2004至2009年覃重军研究组与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发展了一系列国际先进的关键技术,实现了多拉菌素原料药和制剂的工业化生产,纯度达到97%,产品质量部分指标甚至优于辉瑞公司产品,打破了国外垄断。

“你还记得自己的基础研究梦想吗?”2006年5月,在云南玉龙雪山4680米的山顶上,科恩开玩笑地提起覃重军。“当然没有忘记。”覃重军认真作答。

熟悉覃重军的人都知道,他喜欢在纸上写下自己的灵感,不少想法来自他一早一晚的散步。似乎越低等的生物染色体就越少,可为何酿酒酵母的染色体却有16条之多?大自然是否有点随意?这对于研究它的人来说,可能从来就不是问题,而这正是覃重军为之着迷的地方。

2013年,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猜想——真核生物酿酒酵母也许能像原核生物一样,用一条线型染色体来装载所有遗传物质并完成正常的细胞功能。他决定把研究对象换成真核生物酿酒酵母,因为人类就是真核生物,和人靠得越近,研究意义越大。

在旁人看来,这是一个“不知轻重”的疯狂举动,他甚至从未写过关于酿酒酵母的文章。之前他在链霉菌领域深耕了20多年,首次在

粘细菌中发现质粒并建立了遗传操作系统,全世界20多个实验室来函索取质粒载体;他还对“重构简约大肠杆菌基因组”工作做了有益探索。然而,在他看来,这些工作的技术框架都是由国外科学家提出的,他想要做“从0到1”的工作。

2000多页A4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覃重军的科学思考和实验设计。大胆想象之后,需要的是小心求证。只要一有了新思路,他都会和组里的薛小莉研究员几次三番讨论,设计下一步的实验方案。他经常告诉学生,要逻辑严谨,提供最原始的实验数据。即使在实验最紧张的时候,覃重军依然每天去散步,还重温了最喜欢的《爱因斯坦文集》(达尔文回忆录)《巴斯德传》,从中汲取灵感。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2017年9月。覃重军正准备向国际顶尖期刊《自然》投稿之际,他偶然了解到,美国的杰夫课题组不仅做了相似研究,7月已经向《自然》投稿。“当时我第一次体会到手脚冰凉的感觉,后来听说他们只把16条染色体融合成了两条,我又活过来了。”经过将近一年严苛的审稿,期间《自然》编辑还要两家课题组彼此交换手稿,最终在2018年8月2日,这两篇论文同时刊登。

抓紧到科学前沿的前沿去

“7年前覃老师第一次找我谈话时,就讲了科研的不同境界,前几天他再次跟我提起,鼓励我要做原创发现。”论文第一作者、博士后邵洋洋说,受覃重军喜欢攻坚克难的影响,她也已习惯了“不走寻常路”。

论文发表后,覃重军更加忙碌了,但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就会去散步,继续他的科研畅想。和过去一样,如果连续两天没去实验室,他心里就会发慌。54岁的他最近常念叨一句话:“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要抓紧时间到科学前沿的前沿去。眼下,他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能够解决人类的某个疾病。

“所里这么多研究组,就数我欠的人员费最多。”即使在覃重军科研经费最紧张的时候,他也没花心思去“跑经费”,先是所里“除账”,后来中科院从先导专项里拨款予以了支持。

在妻子方萍眼中,覃重军依然是那个不忘初心、怀揣科学梦想的人。他在家时有时想着科研的事情会出神,压力大时,就听听古典音乐看看唐诗宋词。去年,覃重军在剑桥大学特地给“牛顿的苹果树”拍了照,那一刻,他在心底默念着:追梦一生,只争朝夕!

解放论坛·中国新闻名专栏

“不怕官员一身正气,就怕领导没有爱好”。领导的“爱好”,这几年重新成了热门话题——有的领导爱好摄影,拍遍了大江南北域中国外;有的官员爱好波塞,店招题遍了大店小肆大街小巷;有的沉溺于玉石,成了“玉痴”;有的迷恋于陈醋,成了“醋王”;还有的酷爱紫砂,成了远近闻名的“壶哥”……

但更为“普遍”的“爱好”,恐怕还要算麻将。四角方城,从“小米米”到“麻将”,“怡情放松”到通宵达旦,有的官员的“方城之恋”,到了什么地步呢?这里仅举两例,当然也是挂一漏万——

例一,广安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汪智勇,以“右腿骨折、行动不便”为由,一直未上班,无论多么重要的公务一律推掉。汪秘书长去哪去了呢?包了星级酒店一套三居室豪华套房,住了40多天。这40多天里,汪智勇不分昼夜,与开发商老板打麻将,斗地主,直打得昏天黑地,乐不思返。

例二,深圳市中级法院原副院长黄常青,酷爱麻将,不可一日无此方城,竟在自家阳台专门搭建了麻将房,天天三三晚四聚集“麻友”。黄院长“进去”了,面对审查,“他常常陷入悔恨,不能自拔”,但只要一与办案人员谈起麻将,立即“迅速抽离”,两眼放光,绘声绘色地介绍起“和平麻将”来,手舞足蹈地吹嘘曾经的“辉煌战绩”,甚至反问道“等我出去了,我们一起去切切,我肯定赢你”……

汪秘书长与黄副院长们,为什么如此痴迷于麻将?他们哪来这么多的赌资本钱?他们就不怕大赌伤身、倾家荡产?这也许是坊间网上人们的一点疑虑——其实这疑虑一点也不必有,贪官们日夜麻将,因为他是赢家,是“常胜将军”。墨吏们沉迷方城,因为这是日进斗金的“生财之道”。你看这个汪智勇,40多天在赌桌上就“赚”了百余万元。你看这个黄常青,万一失手,立马就有“麻友”出来,说一句“输了我的”,更不要说他们的“本钱”,每每有老板“铺底”呢——你没听说老板们与南充市原副市长邹平打麻将,一次几十万几百万地“输”给他,“哪怕是自摸清一次也不敢和”啊!

这里有一只箭前才披露的“麻雀”,稍加剖析,便可明白有的官员为什么痴迷麻将乐此不疲的奥秘了——绵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冯军,在麻将桌上通宵达旦,这些年来,通过“假赌”总共“赢”了1114万元呢!

冯主任的“一千万”,是怎么“赢”来的呢?比如说,“老板约我打牌,不会和我的牌,还故意告诉我他要和什么牌,于是我从不会输,每场都是赢家,赢钱的感觉真是其乐无穷”。冯军与某运输公司董事长刘老板一十年要打20多场麻将,刘老板故意输给他好几十万。

又比如说,游老板找到冯主任,请其解决采矿权和土地证,也是在酒店茶楼或公司内部搓麻将,100元起牌,一个晚上冯军可赚近10万元。冯军偷牌、换牌、看牌,小动作百出,游老板睁只眼闭只眼,让他做个彻头彻尾的“大赢家”。几年牌打下来,游老板竟“输”给了冯主任整整100万元!

再比如说,某矿业公司董事长范老板为煤矿复产、贷款贴息事,请冯主任“打牌”。可是范老板不搓麻将啊,那也无妨,每每找人以冯主任“凑局”,又每每事先将“铺底钱”单独交给冯军,一次好几万元,范老板给冯的“铺底”就已达好几十万元……

对于冯主任的“一千万”,再加评论都是多余的了——某些官员的“爱好”,早已不是什么“人之常情”,而己是受贿甚至是榨取的腐败之道,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这些战无不胜的“常胜将军”在方城中的豪取巧夺“其乐无穷”,以及那些老麻将桌上要输百万银子的“老板”们的“无哭之泪”,对于某些贪吏的“爱好”已经做了最好的注解啊!

麻将桌上的「常胜将军」?

司马心

我和《解放日报》征文

从版面上发现社会“真问题”

刘宪权

上海《解放日报》与新中国同龄,而作为忠实读者与专栏作者的我,更深知他与万千读者同心。

我是上海的一名法学研究者与教育工作者,我与《解放日报》之间的故事并不轰轰烈烈,但它们却真实地存在着,如同涓涓细水,长久以来点点滴滴在我的科研与教学过程中。

我有一个保留多年的习惯,那便是定期将近日的《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所刊载的重要时事新闻从报纸上裁剪下来收藏备用,它们是我触摸上海、中国乃至世界的媒介,也是我从从事法学研究的素材库。我始终认为,法学是一门经世致用,致力于构建人间秩序的“治国之学”,它要求法学研究者密切关注国家问题、社会问题、现实问题,发现“真问题”并妥善解决之,是每个法学研究者的终极目标,也是法学家对其身处时代的历史使命。我们可以去哪里寻觅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真问题”呢?投身实践固然是一个办法,但个人受时空的限制,无法做到事事亲历、远近皆及,所幸一份高质量的报纸能够成为

我们了解国事、天下事的窗口。其所报道的新闻事件、社会问题或国家方针政策,往往成为我的研究对象和论文选题,乃至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选题,因为我知道,它们都是当下中国最亟待研究的、最真切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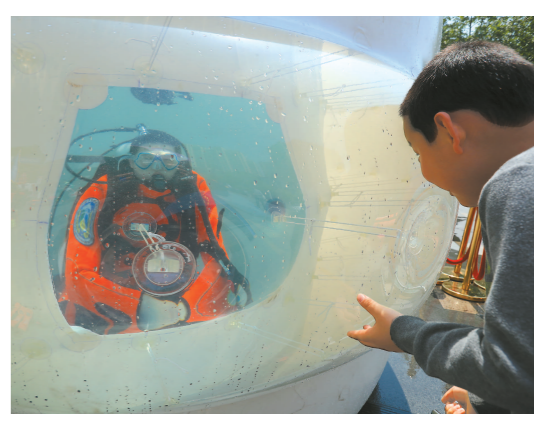
我时常提醒青年学者,切勿埋首故纸堆、凭空冥想、闭门造车,却对社会的运转、历史的规律、国家的当下与未来缺乏关心。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中道出他历经40年研究所下的“最终结论”:“我们应当学到了足够多的东西,以避免用扼杀个人互动的自生自发秩序的方式去摧毁我们的文明。但是,要避免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摒弃这样一种幻想,即我们能够经由刻意的思考而‘创造人类的未来’。”他认为,“社会世界存在自生自发的秩序,其乃‘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由此方才引发真正需要解释和理解的问题。脱离深度的社会观察而一味作‘刻意的思考’,不是法学研究应有的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的法学研究者尤其要成为《解放日

报》的读者。《解放日报》真实地记录着上海市民的喜怒哀乐、社会变迁的阴晴雨雪,以及这座城市领导人也在忧心的,事关上海未来发展的大议题真问题。作为智力贡献者,我们只有尽可能地了解上海,才能更好地为上海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解放日报》平日所报道的社会热点、法治新闻,还时常被我写进刑法学课程教案里。它们都是再真实不过的事件,远比刻意虚构出的案例更“接地气”,更易使学生身临其境、引发共鸣。我欣喜地看到,同学们往往能结合自身生活体验,从某一事件之不同维度或侧面进一步延伸问题的枝节,乃至形成新的知识增量,这也超出了我的预期。受惠于《解放日报》,我的教学案例从来都是常变、常新的,唯独不变的是我尽力维系课堂内与课堂外、个人与社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联。在我看来,这份关联极其重要。我时常建议法学专业的学生多看报,“日日看报,则心目中时时有一社会国家之概念,而忧世爱国之心自愈积愈厚,且得有种种之常识”(杨昌济语)。若不“忧世爱国”,我们可能会逐渐淡忘立法的初心;而若无“种种之

常识”,我们也不可能学好法学。

在科研与教学之外,我还是一名《解放日报》的作者。没有什么事是比将自己的所思所悟分享给读者更能令一个作者感到满足了。感谢《解放日报》曾邀我开辟“法眼看社会”专栏,多年来陆续发表了几十篇法学时评,如《盗医医生的罪与罚》《防范性侵犯未成年人的体与用》《民警摔婴案的简与繁》《错放与错判中的司法理念》等等。除此之外,我还时不时在“思想者”版面上发表一些自认为经过“深思”的论文。《解放日报》在专业撰稿人与广大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引导民众以专业视角分析社会现象,以及传播法治理念、弘扬制度文明的作用。《金刚经》云,“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所得福德不及“为他人说”,用世界上所有最珍贵的宝物布施他人,所得福德仍比不上将佛法真义说与他人听。《解放日报》及其每个撰稿人如毛泽东同志在发刊词中所说的那样,“愿拘至诚,以告国人”,以至诚之心道至诚之语,担负着向国人传播知识、思想与真理的重任,其所得福德更是不可估量的。(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导)



昨天,上海“5·12”防灾减灾应急演练在宝山区大场镇商业广场举行。现场除了高空绳索横渡、索降救援演示外,还有专业救援人员教授群众逃生以及救援技能。图为救援人员在演示水中救援。 本报记者 张海峰